

ZHONGGUO CHUANTONG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研究

肖杰 著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

肖 杰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 / 肖杰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01-6566-0

I . ①中… II . ①肖… III. ①廉政建设-政治思想史-中国 IV. ①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6590号

书 名：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
作 者：肖杰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安斌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0 字数：190千字
ISBN 978-7-5601-6566-0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印刷
2010年11月 第1版
2010年11月 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廉政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1
二、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之现状.....	2
三、本书的架构和特点.....	4
第二章 “廉”的释义及传统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6
一、中国古代“廉”的释义	6
二、廉政及传统廉政思想的内涵.....	14
第三章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	19
一、天人之辨确立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19
二、义利之辨确立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伦理规范.....	23
三、公私之辨确立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政治准则.....	27
第四章 以德养廉思想	33
一、“德”的概说.....	33
二、以德治国：德与政治的结合.....	35
三、德治与廉政：道德成为廉政行为的内在约束.....	40
1. 德治崇圣的君道论对君主的道德约束	41
2. 三纲五常的臣道论对官吏的道德约束	45
第五章 以法促廉思想	52
一、“奉法强则国强，奉法弱则国弱”的法治主张.....	52
二、“以重刑惩贪吏”的法治主张.....	55
三、重刑惩贪与廉政.....	60
第六章 制度保廉思想	63
一、“有法度则治”的治国思想.....	63
二、治腐反贪的主要制度举例.....	65
1. 匡正君王失误的朝议、朝会和谏诤制度	65
2. 择优防腐的选官制度	69

3. 抑制官吏勾结营私的回避制度	71
4. 纠弹官吏素失的监察制度	73
5. 奖勤罚懒、褒廉惩贪的考绩制度	76
第七章 儉朴戒贪思想.....	80
一、“俭以养廉”的政治主张.....	80
二、“政在节用”的以俭治国主张.....	81
三、为政简约与明主盛世及廉吏.....	83
1. 明主盛世与简约为政	83
2. 儉朴戒贪与廉吏	88
第八章 勤政为民思想.....	94
一、以民为本的思想.....	94
1. “夫民，神之主也”	94
2. “君为民立”、“吏为民役”	96
3. 民为邦本	99
二、为政之道在于爱民、利民、富民、教民.....	102
1. 爱民思想	102
2. 利民思想	103
3. 富民思想	105
4. 教民思想	106
三、民本论与廉政.....	107
第九章 厚俸养廉思想.....	111
一、俸薄不足以止贪，厚俸可以养廉.....	111
二、历代官吏俸禄与廉政.....	115
第十章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总体评价.....	120
一、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优秀传统.....	120
二、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历史局限.....	124
(一) 君主权力：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禁区	124
(二) 封建特权：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盲点	126
(三) 家国不分、尚忠灭公：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腐蚀剂	130
(四) 廉政思想贯彻得不彻底，导致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的周期性循环.....	132
三、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现实启示.....	134
(一) 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135
(二) 注重道德建设，提高为官者的“官德”修养.....	135

(三) 廉政建设的效果要以民众为检验的标准.....	136
(四) 高级领导干部是否廉洁事关廉政建设的成效.....	137
(五) 廉政建设重在实践.....	137
参考书目	140
参考文章	146
后记	151

第一章 绪 论

我国古代关于廉洁从政、勤廉治政的论述很多，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但关于廉政思想的论述大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研究也不多见，这与其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一、廉政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诞生了公共权力以来，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如何对待公共权力的问题。是掌权为公，还是握权谋私，是对待公共权力的两种基本态度。而对待公共权力的问题，也是治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理念和方略问题，是如何认识政治、如何践行政治理念和方略的问题，即是如何为政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何为政理民，怎样治国安邦，历来为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政者是否清廉、勤勉，事关国家的兴衰存亡，决定着王朝的兴替变迁。古代史上的无数事例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勤廉为政则国兴、国运昌；怠政腐败则国亡、社稷毁。周王朝之所以灭商并延祚八百年之久，是与周文王、武王、周公旦等倡导的廉政思想及廉明的政治实践密不可分的。也正是由于刘恒和刘启、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清圣祖玄烨等昌明廉政，才诞生了历史上辉煌灿烂并被国人们引以自豪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盛世文明。而夏朝、商朝、隋朝的灭亡，周王朝的分崩离析，秦帝国的短命，明中后期的腐败，无不是执政者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怠疏政事的结果。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史，就是清洁廉政与腐败怠政斗争的历史。廉政思想也因此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条主线。国内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也都把如何对待公共权力（国家政权）、治国安邦、为政理民视为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徐大同教授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写道：“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

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1]维持国家政权，就必须摒弃腐败，倡行廉政。刘泽华教授认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关于政治实施理论以及政治权术理论也应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进行政治决策以及如何把政策、政治规定和各种行政措施付诸实现，这是政治思想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关于进谏、纳谏、庭仪、兼听、独断、考课、监察等等。”^[2]朱日耀教授也认为：“就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内容来看，至少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即政治哲学，国家与法的学说以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治国方略”^[3]。

无论对政治思想史的内涵如何界定，但方家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不把对待政权、治国安邦视为基本内容。对“政治”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这里作者也不想添入讨论的行列。由于“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如何夺取、巩固、运用国家政权也就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实则是“治”政。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专家学者把对待公共权力（国家政权）、治国安邦、为政理民视为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正是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的实质及核心。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从夏商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法家的刑治主张、墨派的兼爱节用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说等，乃至后来成为历朝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德治思想等，也都是以如何巩固当时政权、为政理民为核心的。古代的政治家在探索治国安邦之术的过程中，都谈到了廉政、勤政的问题。在历史上，廉洁勤政一直是为政做官的光明正道，为历代统治者所张扬。尽管有的统治者出于阶级的本性，言行不一，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说的是勤政廉洁，做的是贪赃枉法，但任何人如桀纣隋炀帝等、任何时代如秦隋明末等，也没有提出过与廉政相反的命题，没有公开宣扬暴政和腐败的。相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围绕着勤政、廉政、治国安邦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成为贯穿历史、左右王朝兴衰存亡的一条主线。

二、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之现状

政治思想是政治现象的伴生物。自从进入人类社会，出现公共权力，诞生政治现象之后，如何诠释政治现象，怎样对待公共权利，不仅是为政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治思想便应运而生。政治思想诞生、存在的久远，并不等同于研究政治思想的久远和深透。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只不过是20世纪以来近百年的经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梁启超、萧公权首开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之先河，成为中国古

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第一批拓荒者。随后，著名学者吕振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著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春天的到来，以及国内有些高校相继设立政治学专业，恢复了政治学的研究，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潮流的推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卓有见地的学者，也出版了一大批有深度的研究论著。如徐大同教授等人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刘泽华教授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朱日耀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成为这一时期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水平的代表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逐步深入，宏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成果迭出的同时，多角度、多侧面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既说明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入，也是该学科领域研究发展的必然。就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方面而言，也有不少学者把思维的触角伸到了这里，尽管研究是初步的，还有些差强人意，但也有一些成果问世。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廉政建设方面的专著有：单远慕、刘益安等编著的《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版）。还有一些论著虽不是以中国传统廉政建设为主题，但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廉政问题，如李法宝等著的《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费洪智等人编著的《廉政大观》（长征出版社，1991年版）、王茂林等著的《廉政建设概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曹德本著的《儒家治国方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吕鹤云著《国家廉政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邱永明著的《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守和主编的《中国历代治国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刘明波主编的《廉政思想与理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田广清主编的《古代治国方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崔新民编写的《勤政廉政史鉴——中国古代廉吏事迹荟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余华青著的《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林岩等著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集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文章论及中国传统廉政思想。

综观涉及到中国传统廉政建设思想的论著和文章，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研究廉政制度多，论述廉政思想少。我们且不谈余华青等人著的《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直以“廉政制度史”名之，当然要以制度为主

线。就连单远慕等编著的《中国廉政史》也是以廉政建设的实践为主，偶有廉政思想的论述，也不够系统、具体，且与廉政实践所占篇幅相比，殊悬甚巨。作者在这里并无意褒贬二书的著者们，仅就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的现状及受重视程度而言。

第二，研究廉政建设个案多，整体研究少。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集权的社会，君王皇帝口衔天宪，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是典型的“人治”型社会。它注重的是个别少数人的作用，极少数人在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史书也一直这样记载着，有本纪、列传、世家等。史书中的循吏传、贪官传等，记录着某个人的为官廉否，如廉政行为、廉政措施等。受着传统史学的影响，对廉政方面的研究则体现在个案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对廉政的整体氛围、理论基础、发展趋势、历史效应等研究不够。

第三，研究个别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多，系统论述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少。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众多人共同推动着历史发展。但某一个人并不能完全代表着历史。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也是由众多政治家有关廉政论述、主张组成的，研究古代个别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思想是推动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研究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不能以古代个别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思想替代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两方面的研究应相互促进，互相推动。就目前研究中国传统廉政思想而言，研究个别政治家、思想家的廉政思想稍多些，而缺少对中国整个古代社会廉政思想发展的宏观论述，缺少对廉政思想的主要发展脉络、主要内容等方面的研究。

三、本书的架构和特点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研究现状与这一思想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不相称的。廉政思想，它涉及到史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领域。本书拟对中国传统廉政思想进行爬梳整理，并进行评价分析，汲取精华，以裨于现实政治生活。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至今在学术界很少论及。为政要廉、为政要勤的思想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一思想蕴藏于为政者及思想家的言论之中，史籍中俯拾皆是，但是并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长篇宏论而又周密地阐述过这一思想，因之一直很少有人系统地整理论述传统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书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些探索。

第一，从古代的天人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等因素来探讨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传统文化中的纲常道德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维，也规

范着为政者的言行，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是传统文化长期沉淀的衍生物。

第二，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从伦理道德层面、法制层面、制度层面，把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概括梳理为以德养廉思想、以法促廉思想、制度保廉思想、简朴戒贪思想、勤政为民思想、厚俸养廉思想等六个方面。

第三，探寻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优良传统、实践的局限性及对现实的启示。

研究中国传统廉政思想，需要披览浩瀚的历史文献，查阅每一时期重要思想家的论述，其费时耗力之多，并非作者能力所及，这也是作者在写作该书时所常常慨叹的。

注释：

[1] 徐大同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2]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5页、第6页。

[3] 朱日耀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导言”第2页。

第二章 “廉”的释义及传统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研究中国传统廉政思想，首先要探究“廉”的源流及其衍生之义，进而分析廉政的内容、廉政思想的内涵。

一、中国古代“廉”的释义

“廉”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常见的一个字，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典籍中，“廉”的含义有多种，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都涉及到并使用过这个概念。

1.从字词学来讲，“廉”的本意为侧边、棱角，引申意为狭窄、刚直。

据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字书、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解释，“廉，仄也，从广兼声。”清代段玉裁注为：“此与广为对文，谓逼仄也。”仄有侧旁、狭窄之意。清代的桂馥在《说文解字义证》中，除了与段注相同外，还指出：“廉，棱也。”在先秦及以后的文献中，取此本意而用的并不鲜见。如：

“设席于堂廉东上”。^[1]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譬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2]

此二处“廉”字，皆为侧旁、侧隅之意。

廉者棱也，多是指物体之“廉”，即物体露出棱角或曰有棱角。《周礼》里在讲到制造车舆时，曾出现过“廉”字。“望其轂，欲其眼也；进而舐之，欲其骍之廉也。无所取之，取诸急也。”^[3]《礼记》中在讲到各季节之“礼”时，也使用了“廉”字。“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4]陈皓注，“廉，棱角也，亦矩之义”。孙希旦把“器廉以深者”解释为：“外有廉隅，而其中深邃，象金器之严肃而收敛也。”这里两处出现的“廉”，意同，都是指器皿物体突出的地方，即棱角。

由“廉”字侧旁之原意，进而喻狭窄。如“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犁欲廉，劳欲再”。^[5]“犁欲廉”是指用于耕地之犁的行道要狭窄。在诗中也有用“廉”形容瘦削之状的。如“馈食纤纤而曰鲜，体貌廉廉而转损”。^[6]无论是狭窄，还是瘦削状，都是由侧旁之意引申的。

有棱角，棱角分明突出原是指物品器皿，后又用“廉”字喻人的品行，多指人的品性端方不苟、方正刚直。“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固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7]此处“砥厉廉隅”，朱熹注为“砥厉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刊方以为圆也”。孔颖达疏为“近文章砥厉廉隅者，言儒者习文章以自磨厉使成己廉隅也”。二人的注疏大同小异，都是指人的行为品性而言的。在《论语》、《荀子》、《韩非子》等书中，都有用“廉”喻人的行为品性的句子出现。只不过是具体意思小有出入。“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8]这里的“廉”是棱角峭厉、厉害之意。“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为至文。^[9]该处的“廉”是厉害、严厉之意，如果用现今语言意译为原则性强。“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10]此处之“廉”是方正的品德之意。

从字词学来看，“廉”字在古文中还有“少”之意，韩愈在《原毁》一文中，就是用“廉”来表示少。“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韩文中数次出现“廉”字，其意皆同。“廉”字在古籍中与苦、纤连用，也是细小之意。如用廉苦者：“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窕廉苦，随体散布。”^[11]廉与纤连用多出现在诗中，如韩愈《晚雨》诗中有：“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黄庭坚的《次韵赏梅》诗中也有：“微风拂掠生春丝，小雨廉纤洗暗妆”，等等。

2.“廉”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代表着一种政治思想主张。

先秦诸子的文献中，多用“廉”来表示一种较高尚的道德行为，或表示从政的一种行为。

“廉”的棱角本意引申为品性方正刚直，上文已论述过。另外，“廉”还有清廉、廉洁、廉耻之意。据汉代刘熙的《释名·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梁顾野五在《玉篇·广部》中则解释为，“廉，清也”。

“廉”成为伦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表示一种操守，一种境界。儒、道、墨、法等诸家曾用“廉”代表值得称道的操守行为。

儒学始祖孔子在《论语》中虽然很少用“廉”字直白操守，但在他的思想中，已包含后来孟子所倡行的“廉”的内容。孔子善用“耻”表达自己的操守主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这里孔子主张用德、礼来教化人们要有廉耻之心。孔子还说：“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3]孔子提倡人要有执著的追求精神，坚信自己所学之道，不苟金钱权贵，否则就是“耻”。孟轲在其言论集《孟子》一书中，有数次直接用“廉”、“廉士”来表示一种操守。如在“滕文公下”中有：“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这是齐国将领匡章向孟子发问时的一句话。孟子虽然不同意陈仲子为廉士，但他在答言中认为“廉”是较高的一种境界，是与伦理仁义相融合的节操。

在先秦的儒家代表人物中，从人的道德操守角度来讲“廉”并论述最多的是荀子。荀子认为廉耻之心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孟子曾论述过人要有“羞耻”之心，“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4]而荀子直接提出使用了“廉耻”这一概念，廉耻之心是正人君子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操守。“端悫顺弟，则可谓善少者矣；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钩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15]人缺少廉耻之心，就会分不清是非，唯利是图，为利而抛弃道义良心。荀子认为，人的勇敢分为禽兽之勇、商人盗贼之勇、小人之勇和君子之勇，如果无廉耻之心则会成为禽兽之勇。“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悻悻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16]那么，怎样培养廉耻之心呢？荀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性恶，只有通过后天的教化才能摆脱“小人”之态而成为君子。“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君子非得势以临之，则无由得开内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安知辞让？安知廉耻、隅积？亦呐呐而噍，乡乡而饱已矣。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17]

道家的典籍中，也用“廉”表示一种高尚的境界和操守。老子用“廉”字形容“圣人”的一境界，“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18]庄子也数次提到“廉”字，他主张“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19]把“廉”视为一种行为、一种作派、一种价值取向。庄子还认为，“廉”的形成在于自身的内在修养，“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

度。”^[20]这一点与荀子的主张是相近的。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在强调权、术、势的同时，也认为有“廉”之节操，才能轻财，甚至舍生忘死。“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21]墨子也视“廉”为君子之行，墨子认为“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22]作为君子，要有“廉”、“义”、“爱”、“哀”的品行修养，始终如一，贫困时也能守住“廉”，富贵时也不能丢弃“义”，见生者现“爱”，遇死者现“哀”。

秦以后，从伦理道德角度说“廉”最多者要首推汉代的刘向。他继承了先秦儒家传统的荣辱观、节操观，把“廉”看成一种高尚的情操，是圣人君子所必备的品质。他认为，名节道德非常重要，“廉”重于生命。刘向在其对话体的杂著类编《说苑》中，多次提到“廉”。如“不让以位者，不廉也”^[23]；“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24]；“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乐，毁廉者莫甚于色，摧刚者反己于弱”；“恭敬逊让，精廉无谤，慈仁爱人，必受其赏”^[25]；“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名章也”^[26]；“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27]等等。究竟“廉”是一种什么样的操守品格呢？如果我们仅从字面来看比较费解的话，那么我们从刘向视为“廉”之人之事例中可以窥见其“廉”之内涵了。刘向谈“廉”时与伯夷、叔齐二人相联居多。

在刘向著的《说苑·立节篇》中有如下一段话：

“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尾生杀身以成其信，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所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

《说苑·杂言》篇中还引用孔子与弟子仲由（即子路）有关善恶相报的一段对话，其中也把叔齐，伯夷二人与“廉”联系起来。孔子被困于陈国、蔡国之间，七天没有吃到粮食，但孔子仍“读诗书治礼不休”。仲由在困境中产生了疑问，善者天报以福，不善者天报以祸，先生率弟子积德行善，为什么还处于这样穷困的地步呢？孔子答解道，“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孔子并举例说道：“予以夫知者为无不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乎？伍子胥何为扶目于吴东门？予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于首阳山之下？予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荆公子高终身不显，

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

在刘向看来，伯夷、叔齐可谓“廉”。伯夷、叔齐是儒家一直称道的人物。《论语》中有四处提到二人，孔子称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28]，“古之贤人也”^[29]。《孟子》中也数次提到此二人。虽然孟轲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30]但他还是称道伯夷、叔齐时多，认为他们是古之圣人，“天下之大老也”^[31]，“圣之清者也”^[32]。其德操能荡贪祛懦。

据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和《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有关资料，伯夷、叔齐二人之操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谦让不贪。伯夷、叔齐二人俱为殷商孤竹君之子，其父欲立叔齐，叔齐则让伯夷，二人互相谦让，最后却离走孤竹国而不就孤竹国之君位。被商王分封的诸侯，无论其食邑领地是大还是小，但消费享乐威福有加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叔齐与伯夷推让不就，视荣华享乐为粪土，实乃廉也。其二，伯夷孝尊父命。孤竹君墨胎初即伯夷、叔齐之父，生前曾有让叔齐将来继承封地孤竹国之意。墨胎初死后，叔齐想让哥哥伯夷继承父亲之封地。子承父业是人类社会父权制确立之后的共识，实践中也确是如此。但在商代传子制度中，没有嫡庶之说，有人考证商代王位继承实行的是幼子继承制。^[33]从此说的话，叔齐继承父位符合习惯，但叔齐却让哥哥伯夷继承父位，伯夷不贪恋此位，曰“父命也”。遵父命不继。伯夷实乃孝也。其三，逐道向善。伯夷、叔齐二人不就君位离走孤竹国之后，闻听西方有个西伯昌，是个仁德之君，二人思忖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是时，商之西方周部落日渐强大至西伯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34]同时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颁布了“罪人不孥”、“有亡荒阅”的法令。^[35]鳏寡独孤均有安置，人民安居乐业。周文王西伯昌治国有道，伯夷、叔齐闻而趋之，乃逐道向善也。其四，舍身保节。周武王继文王位后，东伐商纣，伯夷、叔齐二人极力劝阻，认为此乃不孝不仁之举，待劝阻无效后，二人又离开周地北行，至首阳山，时天下宗周，殷纣亡。伯夷、叔齐乃义不食周粟，日以采薇延活，最后终至饿死，实现了舍身保节的愿望。“廉”、“孝”、“善”、“清”是伯夷、叔齐二人彰显后人的操行，足以使士人敬之，顽夫从之。

用“廉”来表示从政的一种行为，把“廉”与政治联系起来，在先秦的典籍中亦不少见。最早把“廉”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的是《周礼》一书，“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36]这“六廉”是考核官吏政绩优劣的准则：廉

善，指善于行事，能把事情做好，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指能彻底地推行政令，清廉能干；廉敬，指不懈于位，谨慎勤劳，尽职尽责，清廉而忠于职守；廉正，指公正廉直，品行方正，清洁正直；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清廉守法；廉辩，指明辨是非，头脑冷静清醒，清廉明辩。这六条准则都冠以“廉”字，强调“既断以大事，又以廉为本”，体现了对为官者“廉”的基本要求。

在先秦诸子中，把“廉”与从政行为联系起来的主要有三人，即墨家的晏婴、法家的韩非和管仲。晏婴，这位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世，他有关治国为政的许多言论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有耀眼的闪光之处。如他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社稷重于君主论、君臣关系上的和同论等。晏婴认为，“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非其私昵，谁敢任之”。^[37]晏婴把君主与社稷分开，故臣要为社稷尽忠，而不应是君主个人的仆人。如果君主为社稷而死，臣应尽忠，殉主与殉国是统一的；如果君主为个人私事而死，臣没有殉死的义务。当齐庄公因淫乱被杀，晏婴只是抱尸痛哭一场了事，而不去殉死。在君与臣的关系上，晏婴主张是“同”而不是“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38]。显然，“和同”论蕴含着民主因素。晏婴继承了墨家兼爱、节俭的思想，主张爱民，实施善政。他强调，“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爱民”^[39]。爱民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政权才能稳固而长久。“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速亡也。’”^[40]统治者要掌握统治艺术，晏子认为，统治者的行为要像水一样。水以柔为性，但却能使坚石洞穿。水之性，出之以和平，智能驭物，而物乐为驭。所以晏子说，其行水也，廉政而长久。如果统治者的行为像石一样，石以刚为性，刚虽坚但易折，坚强行之，随在忤物，则虽廉政而速亡。晏婴曾多次论述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在论述为臣之道时，认为为臣者有“三求”则废，“为臣，比周以求进，逾职业，防下隐利而求多，从君，不陈过而求亲，人臣行此三者则废”^[41]。比周以求进，即结党营私巴结媚上；逾职业，防下隐行而求多，即乱用职权谋取私利；从君，不陈过而求亲，即顺从君之过以求亲媚。晏婴接着指出，君主要按此三条来“察士”，“顺则进，否则退，不与上行邪，是以进不失廉，退不失行也”^[42]。“廉”是为官